

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研究

彰显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自信

陈彦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这一实践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宏观调控新理念,逐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和实践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对经济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这一体系既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也涵盖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多类经济政策,形成目标多元、工具多样、协同联动的调控框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宏观调控方式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相互叠加,政策目标日渐多元化,导致少数工具难以兼顾多重目标;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财税金融传导不畅等深层次问题可能削弱政策效能,亟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破解;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术催生新质生产力,也给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拓展提升,正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和重要理论创新。

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宏观经济治理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经济治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改善政策效果的改革举措等。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治理理念从侧重于政策工具操作的“宏观调控”,升级为立足国家治理高度进行系统谋划的“宏观经济治理”。

“十四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其内涵持续深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并将其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制度层面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系列部署标志着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进入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

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四点。一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治理要着眼于系统性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构建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消费基础作用和创新内生动力的高质量增长路径。二是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控”。这意味着要形成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协同并进的治理格局,相应地,需统筹强化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三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为明确要求,并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挂钩。在实践中,要把制度建设与效果检验结合起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四是将预期管理纳入全过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超越了西方预期管理仅限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将预期管理升级为贯穿治理全链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把握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特征

各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支撑。“宏观经济治理”具有主干性、原创性、实践性、引领性等标识性概念所应具备的特征,是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实践问题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引领性。

一是具有显著的主干性。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等少数概念居于主干地位,分别从通过政府政策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和通过有效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两个维度支撑起学科框架。“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对西方“宏观政策”的简单替换,它意味着从“被动调控短期波动”转向“主动建构治理体系”,在目标维度、工具种类、协调机制和政策逻辑上均有根本性差异,是对宏观政策范畴的整体性升级。正是依托这一主干概念,中国宏观经济学得以将分散的政策实践系统化 and 理论化,构建起逻辑自洽的学科体系,进而形成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具有突出的原创性。长期以来,西方宏观政策理论聚焦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逻辑,政策目标与工具相对单一。“宏观经济治理”立足多重目标和多重约束的复杂现实,是一个融合目标协调、工具组合和主体协同的整体性框架。它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形成“规划引领、政策协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框架,涵盖治理目标、主体、工具与协同机制。而且,它突破了总需求管理的传统理论缺陷,强调供给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2月28日在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与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这在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和治理范式上均形成了新的理论表达,超越了西方以短期总量调控和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理论范式。

三是具有坚实的实践性。宏观经济治理既源自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安排,也植根于中国应对增速换挡、外部冲击等现实挑战的丰富经验。从制度安排来看,无论是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中长期战略引领宏观走向,还是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强化跨部门、跨周期的顶层协调,抑或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经济工作,都有利于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从应对冲击来看,国际上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后期均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与大幅波动,而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过渡到当前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得益于区间管理、定向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下的创新举措。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和调控效率,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实践有力证明,“宏观经济治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新。

四是具有强大的引领性。知识层面,它引领相关领域将中长期规划、结构政策、风险防控、跨周期设计等系统地纳入分析框架,能够带动形成一套更加综合、更能回应复杂现实的知识体系。理论层面,它强调系统观念,引领形成多重目标动态平衡、供给需求双向发力、国内国际统筹协调等新命题,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方法层面,它突破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为基本方法论的局限,能够引领探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分析工具,通过数据驱动和复杂系统建模拓展传统方法边界,从而形成更加适应超大规模经济体治理需要的方法论体系。

处理好四个关系提升治理能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政策与改革这四个关系,才能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最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应有机统一、相互配合。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竞争等机制充分生效。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弥补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并防范风险。

第二,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稳定关乎经济健康运行和民生福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必须运用逆周期调节平抑经济波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经济政策不能仅局限于应对短期波动,还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着眼长远、预留政策空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要发挥其前瞻性性与连续性的优势,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三,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因素,也有需求侧因素,二者相互交织,不能割裂看待,必须推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应性。加强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形成对供给侧的牵引作用。因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供给和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

第四,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处理好宏观政策实施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另一方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其中既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也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在发展中,只有坚持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有效协同和良性互动,才能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治理层面的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从消费品的角度来说,推动供需总体适配,方能最大程度激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循环畅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数字消费作为消费市场最活跃、增长最快、变革最深的领域,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的品质,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经济循环的效率。提升数字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不仅事关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也关乎新业态新产业的适配性、迭代力。

一般来说,数字消费品更多指的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以数字化形态呈现或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活动,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内容等。与传统消费品有所不同,数字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具有新的特点。从需求来看,数字消费品从产品消费转向场景消费,消费者购买的已不再是某个孤立的数字软件或设备,而是嵌入在特定生活场景的数字工具和方案。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对于同一类型数字消费品的需求可能截然不同。同时,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可使用性,而是追求界面设计的美学感和交互体验的流畅度,对数字消费品提出了场景化、细分化、品质化的新要求。从供给来看,传统消费品的生产逻辑是功能参数导向,而数字消费品的生产逻辑正在从功能参数导向转向更多考虑情感满足。

供需适配性是指供给端与需求端在品种、质量、价格、渠道、时间、结构、效用等维度的精准匹配和动态平衡。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正好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消费者想要的产品,企业短时间内能制造出来。供给端需要持续地观察、响应甚至主动预测消费趋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以保持供需适配。供需适配性是持续进行的动态调整过程,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定义、共同创造的过程。供需的“双向奔赴”既要求供给端敏感捕捉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也要求供给端具备前瞻性设计与场景创新能力,以新产品、新服务主动开拓消费市场。

数字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不同于一般的平衡,更需要关注结构性匹配与动态响应能力。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供给的同质化与需求的多样性并存,导致供需适配性不强。提振数字消费需求点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同时,供需适配性强调动态响应能力,数字消费品需求的变化速度远超传统消费品,要求供给端具备随需而变的敏捷性,以低成本、短周期完成供需匹配的调整。此外,数字消费品的适配是需求牵引供给与供给创造需求的统一。数字消费品的研发需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供给端要具备主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不仅要回应显性需求,还要洞察隐性需求,通过场景创新、技术组合、价值重塑,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从一定意义上说,聚焦数字消费品提升供需适配性,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可选项,而正在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实践中,要坚持供给端和需求端、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提升供需双向响应能力是首要的。从供给端来看,需以消费者为核心,围绕消费者真实需求调整产品方向,回应不同需求。既要感知响应型需求,对消费者已明确表达的需求给予及时响应;又要分析潜在需求,通过消费者行为数据发现已经呈现但未必要意识到的需求;还要创造前瞻型需求,基于技术趋势与场景想象,主动设计新功能、新形态,引领需求升级。从需求端来说,面对消费者群体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特征,应提供更有力量、更有效的资源支撑。例如,当消费者难以做出消费选择时,相关平台或机构可通过提供清晰的产品对比信息、建立真实客观的数字消费评价体系等方式,帮助消费者明确自身真实需求,从而做出符合真实意愿的决策。

瞄准供需适配提振数字消费,不能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还需要机制创新。比如,建立数据驱动的需求感知与产品迭代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实现供需适配,让数字消费品从千篇一律走向个性化定制。又如,建立数据驱动的需求创造与供给引领机制,主动点亮场景,通过示范效应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再如,建立产业链协同的敏捷响应机制。数字消费品的适配性涉及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内容生产、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等多个环节的协同,需要优化产业链的组织效率,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模块化生产、弹性产能配置等手段,使整个产业链具备对需求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

提升数字消费品供需适配性也离不开政府作用。一方面,要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补齐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建立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数据接口标准,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为企业的需求感知提供高质量的数据资源支撑,减少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适配性的提升需要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此要强化制度保障,规范算法应用。在实践中,还可出台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举措,降低中小企业实施需求感知、敏捷开发、数据驱动的门槛;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使不同群体的需求能够有效表达并被供给端感知,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提升数字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 编 夏 祎
来稿邮箱 jrbll@sina.com

青年学人

场景催生智能经济时代新动能

尹西明

当前,大模型、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突破,不仅为千行百业推进转型升级提供新引擎,更为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那么,如何让这些智能“黑科技”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经济新动能,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答案就藏在“场景”二字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放应用场景,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提出要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培育更多支柱性先导性产业,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这一系列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智能经济发展指明了路径。

场景连接技术与市场

“场景”一词源于文学艺术,如今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场景是指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

通俗讲,场景就是新技术找到“用武之地”的那个具体场域。它既可以是工厂里一条需要智能质检的生产线,也可以是城市里一个需要精准调度红绿灯的交通路口,甚至可以是家庭里一个能听懂方言的智能音箱,或者一句话就能帮你自动规划旅游行程并订票的AI手机助手。

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用有着本质区别,智

能经济时代的场景正在驱动科技—产业发展范式的跃迁。传统技术应用是“技术找场景”,先有技术成果再寻找落地空间,始终处于被动适配的地位;而智能经济时代则是“场景定技术”,以真实场景需求反向牵引科学问题凝练、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与产业培育,场景成为驱动高质量科技创新和高效成果转化

的关键力量。理解场景的重要性,需把握三重逻辑。从技术演进逻辑看,人工智能正从“能会说”的“技术爆发期”迈向“进场干事”的“价值创造期”。大模型已具备理解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智能体则更进一步实现了从“理解”到“行动”的跨越。但技术再先进,也需要在真实环境中反复“磨炼”。通用大模型只是基础,只有在制造、医疗、金融等海量垂直场景中完成微调优化,才能真正创造产业价值;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也高度依赖临床康复、神经疾病诊疗等场景的真实数据积累。

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场景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的重要枢纽。市场规模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场景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桥梁。新场景直接创造新消费、催生新投资,成为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连接器”和民生改善的“连心桥”。一台能扫描一体、自动换水的智能机器人,背后是智能传感、路径规划、人机交互等多个技术领域的集成应用,拉动的是整条产业链,乃至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开发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消费新场景,能加快智能机器人、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应用,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驱动智能向善。

从国际竞争逻辑看,场景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战略新高地。AI领域的竞争焦点已从底层技术研发延伸到场景主导权、生态控制权和

标准制定权。谁掌握了大规模、高价值、战略性的应用场景,谁就能抢占技术迭代的先机,掌握新产业新赛道的主导权。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经济社会应用场景,这是我国发展智能经济的独特优势。从共建具身智能训练场的体系布局,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场景开放,再到打造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全球,我国正在用场景定义技术方向,争夺全球“未来技术定义权”。

从改革创新的逻辑来看,场景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未来产业培育和颠覆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往往超前于现有监管规则、行业标准与制度体系。场景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小范围、低成本、可控制的验证空间,系统性检验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效果,以及商业模式、制度政策是否配套。通过先行先试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向适配,能够有效破解智能驾驶、脑机接口、未来能源等领域的“制度时滞”难题。可以说,场景成为智能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试验场、未来产业抢占发展新高地的“加速器”。

把场景优势转为发展胜势

近年来,我国已形成“国家顶层设计、地方特色探索、企业主体发力”的场景实践格局,场景培育正从零散试点走向系统推进,成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发展智能经济的重要抓手。然而,这仍远远不够。“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智能经济形成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窗口期,需要切实用好场景驱动创新,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走深走实。

国家层面,要强化统筹,系统布局,落实规

划要求,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优先布局一批新领域新赛道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和跨区域跨领域综合场景。建立场景创新容错纠错机制,破解场景落地的制度障碍。强化政策协同,可考虑将场景创新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财政、货币、产业、科技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

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开放协同。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结合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场景。关键要破除“内卷式”竞争,避免一哄而上、同质化发展。要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带头开放场景资源,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场景共创。同时要完善试错容错机制,让创新者敢闯敢试。

企业主体则要拥抱场景,定义需求。领军企业要主动开放场景资源,带动上下游共建生态,中小企业要深耕垂直场景,初创和科技先锋企业则要敢于切入细分市场,抢占未来场景主导权。要认识到,最好的技术不是在实验室“憋”出来的,而是在真实场景里“磨”出来的。

还要看到,场景驱动创新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也需要社会各界参与。从消费者对智能产品的接纳,到社区居民对智慧治理的配合,每个人都是场景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要让智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总之,我们拥有的不仅是超大规模市场,更是万亿级场景资源。把这些“富矿”开掘好、利用好,就能让更多“应用场景”变为“科创胜景”和人民群众向往的“生活实景”,让智能经济能源源不断涌现,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